

北宋元丰洛阳真率会考论^{*}

——兼论“真率”与“耆英”会名的混同及原因

庞明启

内容提要 从南朝以来,“真率”一词就经常用来形容宴饮的简单朴素、宾主的坦诚相待。元丰年间司马光等居洛耆宿所举办的真率会,通过制定会约和实际行动才使其成为一种著名的宴饮形式。它讲究朴素的饮食、简便的礼节和坦率的心情,便于备办而易于持续,背后有着司马光提倡朴素和隐逸风气的用意。从宋代开始真率会与之前文彦博发起的洛阳耆英会就经常被混为一谈。耆英会矜贵炫富、客套较多,二者差别明显,之所以被混淆是因为:一、二会年份相近、地点相同,皆为仿九老会,成员重叠较多;二、耆英会初名“耆年会”,时人仰慕而如是称之,后来称真率会为耆英会者亦应出于此种心理;三、真率会后来居上取代了耆英会,却同时带上了些许后者的色彩。

关键词 真率会 耆英会 混淆 原因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西京洛阳集结了一大批因反对变法而闲居的耆宿老臣,结成了相对稳定的交游群体,其中的士人领袖当推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潞国公文彦博、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致仕韩国公富弼、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判西京留台太中大夫司马光。其中标志性的交游事件则为元丰五年(1082)文彦博发起的耆英会、同甲会,以及元丰六年(1083)司马光发起的真率会。它们皆是不同主题下的宴饮聚会,“耆英”强调与会者的年龄、官爵之高,“同甲”即是同龄之意,“真率”则意味着朴素的饮食、简便的礼节和坦率的心情。它们属于宋初以来士大夫仿慕白居易洛阳九老会的怡老聚会系列,秉承着洛阳“尚齿不尚官”的旧俗。但不同于之前为了突出对九老会的模仿、机械地以人数加“老”字命名的聚会,如李昉等人的汴京九老会、徐祐等人的苏州九老会、郎简等人的湖州六老会,诸会皆冠以新的主题。其中耆英会、真率会最为著名,后者更为一时之盛。当时真率会的参与者除了司马光之外,尚包括文彦博、司马旦、席汝言、王尚恭、楚建中、王慎言、宋道、范纯仁、鲜于侁、祖无择等人。

一 “真率”之名的由来与涵义

“真率”一词顾名思义,本应该形容人的性格和作风真诚、坦率,而南北朝以来对这一词语的使用就常常和宴饮相联系,由此衍生出宴饮中饮食朴素、不拘礼节之意。《世说新语》记载:“过江初,拜官,輿饰供饌。羊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并得佳设。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

^{*} 本文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5XNH035)。

羊固拜临海，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饌。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①宋代有人认为这就是司马光洛阳真率会的滥觞。吴曾曰：“司马温公有真率会，盖本于东晋初时拜官相饬供饌。羊曼在丹阳日，客来早者，得佳设，日晏则渐不复精，随客早晚而不问贵贱。时羊固拜临海守，竟日皆美，虽晚至者，犹获精饌。时言：‘固之丰腆，不如曼之真率。’”^②楼钥《朱季公寄诗有怀真率之集次韵》亦曰：“伊昔羊尹临丹阳，真率之名初滥觞。”^③从“丰华”或“丰腆”与“真率”相对，可见“真率”有简朴的意思在内。

宋太宗朝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从史书中摘录了几则关于“真率”的故事。一则为《晋书》中记载东晋陆纳将赴吴兴太守任时想要宴请桓温，首先问桓温食量、酒量如何，之后便按量供应，“温及宾客并叹其真率”^④。这里的“真率”有待客真诚、俭朴的意思。一则为《宋书》中记载陶渊明嗜酒，有酒必饮，每饮必醉，“贵贱造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⑤。又引《齐书》曰：“武陵王晔性清简，尚书令王俭诣晔，留俭设食，盘中菰菜鲍鱼而已。俭重其真率，为饱食尽欢而去。”^⑥两处的“真率”皆表示在待客上简单、率性，不分贵贱。到了唐代，杜甫《乐游园歌》有曰“长生木瓢任真率”，清卢元昌解释说“酌酒之具不过长生木瓢，何真率也”^⑦，亦为俭朴之意。

在司马光真率会之后，宋人即使不称所参与的宴饮活动为真率会，也会把其中俭朴随意的饮食、不拘礼数的行为形容为“真率”。如与司马光同时的韩维《和公美以诸家会集所赋诗》曰“过从只间里，真率易盘筵”^⑧，两宋之交的曾几《挽王元渤舍人二首》其二曰“觞咏陪真率，言谈见坦夷”^⑨，南宋初年的张栻《三茅观李仁父、刘文潜、员显道、赵温叔、崔子渊置酒分韵得高字》诗曰“杯盘自真率，更起泻浊醪”^⑩，同时期的张镃《又呈坐客》诗曰“从来邂逅宜真率，花下杯传却莫迟”^⑪，南宋中晚期的张侃《春时》诗曰“杯盘草草同真率”^⑫，南宋末年的薛嵎《渔村杂咏十首》其五曰“盘飧市远从真率”^⑬，等等。

可以说，从南朝一直到宋代，“真率”一词已经成为形容宴饮简单率性、宾主真诚相待的惯常用语。而司马光元丰六年在洛阳发起的真率会是第一次明确以“真率”来命名的聚会宴饮活动，不仅在主题和内涵上、更在形式上使真率会成为一种典型的宴饮类型。

二 真率会的形式与用意

司马光与范纯仁制定有真率会约若干条，各种文献中记载详略不同，从中能够看到真率会的举办

① 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中之上《雅量第六》，余嘉锡著，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3页。

② 吴曾《能改斋漫录·逸文》卷一《事始》“真率会”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33页。

③ 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册，第102页。

④⑤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四四《饮食部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4册，第3771页。

⑥ 《太平御览》卷九七九《菜茹部四》，第4册，第4339页。

⑦ 卢元昌《杜诗阐》卷二，台湾大通书局1974年版，第92页。

⑧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版，第8册，第5250页。

⑨ 《全宋诗》，第29册，第18545页。

⑩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张栻著，邓洪波点校《张栻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册，第456页。

⑪ 《全宋诗》，第50册，第31614页。

⑫ 《全宋诗》，第59册，第37141页。

⑬ 《全宋诗》，第63册，第39884页。

形式。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司马公与数公又为真率会，有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惟菜无限。楚正议违约，增饮食之数，罚一会。”^① 蔡正孙《诗林广记》记载会约较多，共八条：“真率会约云：（一）序齿不序官。（一）为具务简素。（一）朝夕食不过五味。（一）菜果脯醢之类，各不过三十器。（一）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或因事分简者听。（一）会日早赴，不待促。（一）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四月日押。”^②《范忠宣公（范纯仁）行状》则简单概括为“脱粟一饮酒数杯”^③。

会约所显示的“真率”的精神内核可以用“简便”二字概括，即一切从简、一切任便。这在司马光生动描写真率会场景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用安之韵招君从、安之、正叔、不疑，二十六日南园为真率会》二首其二曰：“真率春来频宴聚，不过东里即西家。小园容易邀嘉客，饌具虽无亦有花。”^④ 兴之所至，随意造访，主客相忘，毫不以身外之物相介怀。《三月三十日微雨偶成诗二十四韵书怀，献留守开府太尉兼呈真率诸公》更为细腻地描摹道：“追随任尘甑，歌笑望霜髯。落笔诗情放，飞觥酒令严。金丹呼胜彩，玉烛耀新签。傲岸冠巾侧，淋漓襟袖沾。饥仍留瘦马，归必待清蟾。筋力虽无几，娱乐亦未厌。”^⑤ 饌具只是“尘甑”，却碍诗酒歌笑；虽然饿着肚子，仍不妨娱乐到天黑；即便年老力衰、欢宴到晚，而游兴未尝稍减。饮食的简单和精神的丰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简素的饮食和礼节与当时会员们富贵显赫的身份很不相称，但这种宴饮的方式却有着特别的好处和鲜明的用意。解释真率会好处最为周详的是文彦博与范纯仁的两首唱和诗：

文彦博《近闻有真率会，呈提举端明司马》：近知雅会名真率，率意从心各任真。颜子箪瓢犹自乐，庾郎鲑韭不为贫。加笾只恐劳烦主，缉御徒能困倦宾。务简去华方尽适，古来彭泽是其人。^⑥

范纯仁《和文太师真率会》：贤者规模众所遵，屏除外饰贵全真。盍簪既屡宜从简，为具虽疏不愧贫。免事献酬修末节，都将诚实奉嘉宾。岂唯同志欣相照，清约犹能化后人。^⑦

文彦博直接解释“真率”即“率意从心各任真”，任由自己展现出最真实、坦率的一面。进而说真率会在物质上的简约、朴素符合颜回、庾杲之安贫乐道的精神，而礼节上的简化、随意又非常有助于尽宾主之欢，达到娱乐的最大化。同时，这种“务简去华”所带来的适性，又与陶渊明的隐逸精神一脉相承。范纯仁将文彦博“务简去华”的说法进一步升华为“屏除外饰贵全真”，即朋友之间的聚会应该去伪存真，少些表面化的客套和礼节性的装饰，互相以真面目相示，以坦率、诚实的心意相待。他更加立足于现实情况，认为在朋友之间的宴聚比较频繁的情况下，宴会的形式就应当“从简”，如果饮食太奢侈、礼节太繁缛，势必会耗费太多的财力和精力，这样的聚会是不会长久的。而且与会的朋友们贫富不同，轮到贫者操办宴会的时候，在真率的主题和形式下，贫者也不会因为物质匮乏而觉得惭愧，因为平等无疑可以有效地呵护友谊。他和文彦博一样有着道德的论调，但是后者总是追论古人的高节，前者则注意对后人的教化作用。

北宋末年的吕希哲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司马光提倡真率会的优点：“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

① 邵伯温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一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5页。

② 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一〇《司马温公·真率会》中按语，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册，第9797页。

③ 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二〇附《范忠宣公行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15册，第523页。

④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四，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册，第458页。

⑤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四，第2册，第463页。

⑥ 文彦博著，郝继文标点《文潞公集》卷七，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上册，第96页。

⑦ 《范忠宣公文集》卷四，《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第398页。

之曰真率会。”^①这与范纯仁说的“盍簪既屡宜从简”的意思差不多。张耒在评价友人兼取陶渊明、白居易饮酒方式之长、避二者之短时，虽与真率会无涉，但移作对真率会的评论亦极为恰切：“陶元亮虽嗜酒，家贫不能常饮，而况必饮美酒乎？其所与饮，多田野樵渔之人，班坐林间，所以奉身而悦口腹者，盖略矣。白乐天亦嗜酒，其家酿黄醪者盖善酒也，又每饮必有丝竹僮妓之奉。洛阳山水风物甲天下，其所与游如裴度、刘禹锡之徒皆一时名士也。夫欲为元亮则窘陋而难安，欲为乐天则备足而难成。（吴）德仁居二人之间，真率仅似陶，而奉养略如白，至其放达则并有之，岂非贤哉？”^②无独有偶，司马光也将自己置于陶白之间加以比较：“杯盘丰腆胜陶令，园沼繁华减白家。”^③（《三月二十五日安之以诗二绝见招作真率会，光以无从者不及赴，依韵和呈》之《又》）看来司马光倡导真率会也的确是量力而行，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做出适当的权衡。诗中“园沼”指的是他在洛阳的私家园林“独乐园”，这个园林很小，占地仅二十亩。司马光有《独乐园记》，说自己的“独乐”是一种仅能自足、无力及人的“迂叟”之乐^④，虽有一种投闲置散者的愤懑在内，亦见得其经济能力的有限。《范忠宣公行状》亦言真率会的缘起乃因“家贫”：“其（范纯仁）为留台也，一时耆德多在洛。公与司马光皆好客而家贫，相约真率会，脱粟一饮酒数杯，过从不间一日，洛中夸以为胜事。”^⑤家贫而能“好客”，并且频繁到“过从不间一日”，如果不采用“脱粟一饮酒数杯”的真率会的形式是不可能实现的。

司马光素以朴素清廉闻名，居洛时又喜以隐士自居，他提倡真率会、制定真率约还有提倡物质和精神俭素的意味，在闲居洛阳的僚友们竞相奢华、矜贵炫富的风气之外，另开朴素隐逸之风。他的朴素思想集中体现在为其子司马康所写的《训俭示康》一文中，说俭朴不仅是其世代相承的家风，也是他的秉性使然，但是现实却让人痛心，上至士大夫下至走卒农夫皆尚奢靡，风气大坏。他举了古今许多清俭治家和奢侈败家的例子，认为无论君子或小人，俭则立，侈则败，昭然若揭。他特意提到父亲司马池的待客之道，与真率会约极其相似：“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⑥南宋末年的陈著即将此“家法”当做了真率会约：“温公家法：有客则酒三行或五行，侑以果菜，曰‘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意厚’。……庶几共味温公之语，非敢曰真率会自某始。”^⑦从这里可以看到司马光真率会及其会约的家庭渊源，且“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意厚”的说法亦与真率会“盍簪既屡宜从简”、“俭则易供，简则易继”的特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司马光自奉极俭，居洛时依旧如此。据宋庞元英《文昌杂录》的记载，司马光在熙宁四年（1071）卜居洛阳之初居住在陋巷中，屋舍仅能遮蔽风雨，为了避暑只好钻进地下室，而北京留守王拱辰在其家乡洛阳有极为华丽奢侈的园宅、楼阁，“洛人戏云：‘王家钻天，司马家人地。’”^⑧熙宁六年（1073）他买田二十亩，经营起了狭小的私家园林“独乐园”，这与其他闲居洛阳的耆英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王拱辰在要求加入耆英会的寄诗中描绘文彦博的园宅曰：“六相街中潞公第，碧瓦万木烟参差。左隅庙室本经礼，右阁宸翰尊星奎。婆娑青凤舞松柏，灿烂素锦熏醑醑。石渠飞溜漱寒玉，昼

① 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编，第10册，第285页。

② 《题吴德仁诗卷》，张耒著，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卷五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册，第808页。

③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四，第2册，第457页。

④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六，第5册，第204—206页。

⑤ 《范忠宣公文集》，《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第523页。

⑥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九，第5册，第258页。

⑦ 《吉初弥月招宗族亲邻寓饮简》，陈著《本堂集》卷七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85册，第376页。

⑧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页。

夜竿瑟鸣阶墀。”^① 可谓穷极奢华。而当时的耆英会成员张焘在会中所作诗歌赞美富弼的园林曰“韩国园林景物全”，其富丽程度想必不会输于王拱辰和文彦博^②。正如两宋之交的吴芾《答客难》诗中说的那样：“我闻洛阳城，名园浑比迹。至如司马公，朴素世莫及。有园号独乐，晚岁亦加葺。”^③ 司马光在《三月三十日微雨偶成诗二十四韵书怀，献留守开府太尉兼呈真率诸公》诗中表达了对自己无职事而领祠禄的惭愧心理：“清途诚愧忝，微禄已伤廉。日费须三爵，年支仰数缣。糗粮粗能足，蓍蔡不烦占。”^④ 这种心理恐怕文彦博等人是不会有。我们还可以从司马光在洛阳作的诗歌中窥见他的隐逸心理，这固然与当时受到新党人物打击排挤直接相关，但也与他生活上的朴素作风不无联系。如其《独步至洛滨》诗称“拜表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⑤，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与真率会寒素之风相反，之前文彦博发起的耆英会则充满了奢靡的气息、闪烁着官爵的荣耀。据《邵氏闻见录》记载，文彦博早在庆历年间知成都府时就因游宴过度而被人告发，仁宗还曾派人调查虚实^⑥。同卷记载耆英会起始的情形曰：“潞公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公宅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次为会。”^⑦ 文彦博时为西京留守，故曰“地主”，出手相当阔绰，既“携妓乐”又“送羊酒”，这也为以后轮流做会者做出了模范。富弼诗中描写道“塞路移君庖，盈车载春醴。献酬互相趣，欢处不知止”，文彦博的庖厨能够阻塞道路、美酒能够载满车辆，所费当不知几何。文彦博也写诗道“挥麈清谈尽席珍”、“飞觞无算酒行频”。接着二人又写诗以“富贵康宁”、“福寿勋德”互致敬仰、互相夸奖。秘书监致仕刘几则恭维二人道“司徒硕德今无比，太尉殊勋固绝伦”，太常少卿致仕赵丙干脆连带全体与会者一起夸耀，曰：“新春鼎洛燕英髦，主礼雍容下庶寮。二相比肩官一品，十人华发事三朝。星阶并列瞻台耀，樽酒时行挹斗杓。”^⑧ 综观全部耆英会诗，无非都是这种没完没了的夸耀和客套的语言^⑨。无论是从外在形式还是在精神实质上，耆英会与真率会都有着相当大的反差。

① 《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颢年七十一》，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四五《乐生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5册，第748页。

②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开篇即为“富郑公园”，历叙富弼园林景观，评价说：“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参见邵博著，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2页。

③ 吴芾《湖山集》卷三，《宋集珍本丛刊》，第42册，第661页。

④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四，第2册，第463页。

⑤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二，第2册，第336页。

⑥ 《邵氏闻见录》卷一〇，第101页。

⑦ 《邵氏闻见录》卷一〇，第104—105页。

⑧ 以上所引耆英会诗皆出自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四五《乐生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5册，第746—749页。

⑨ 除了上面的例句之外，以下诗句也都是明证：“垂肩素发皆时彦”、“兰亭雅集夸修禊，洛社英游赏序宾”、“更容款密奉簪绅”（文彦博），“系国安危唐上宰，功成身退汉留侯”（席汝言），“端朝凤望两台星，主组参差又十人”、“胜事主盟开府盛”（王尚恭），“立身官未三公贵，推老名陪二相贤”（冯行己），“二相谟猷烂史编，诸公才业过前贤”（楚建中），“相印貂冠聚六符，华颠高会侍臣俱”（王慎言），“仁皇一庄龙虎榜，桂堂先后攀高枝。宦游出处五十载，鸾台骥路俱腾夷”（王拱辰），“功在三朝尊二相，数逾九老萃群贤”（张焘）。耆英会一共十三人，夸耀文、富二相以及其他与会者官爵的作者就有十人。王拱辰在要求加入耆英会的信中说“某亦家洛，位与年不居数客之后”（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五，第5册，第160页）云云，亦强调官位。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些达官显贵们所谓的“尚齿不尚官”其实是“序齿不序官”，即在酒宴当中排序时以年龄为标准而非以官爵为标准，并不代表真的“不尚官”，耆英会的“尚官”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讲求礼节、客套方面，如“不矜崇贵礼容优”（席汝言），“华袞具瞻虽礼绝”（张问），以及“主礼雍容下庶僚”（赵丙），“今日光荣预燕筵”（冯行己），“叨陪几席真荣观”（王慎言），“此日居留许款延”（张焘）诸句都是显例。

耆英会的奢华在当时并不鲜见，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指出：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日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乎！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①

尽管文彦博曾经盛情邀请司马光入耆英会并请其作《洛阳耆英会序》，但实际上司马光只认为“洛中旧俗，燕私相聚尚齿不尚官，自乐天之会已然，是日复行之，斯乃风化之本，可颂也”^②，对耆英会的其他方面并未表示认同。前面引用过文彦博的《近闻有真率会，呈提举端明司马》诗以及范纯仁的和诗，司马光也有《和潞公真率会诗》，曰：“洛下衣冠爱惜春，相从小饮任天真。随家所有自可乐，为具更微谁笑贫。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将佳景便娱宾。庾公此兴知非浅，藜藿终难继主人。”^③这首诗写得十分活泼，后四句充满了对文彦博的调侃。他运用了东晋太尉庾亮在武昌时与下属同乐的典故，开玩笑说没有珍馐可以下箸，能够娱宾的只有眼前美好的春景，长官此时与我们同乐的兴致正浓，但可惜的是真率会的饮食实在太粗劣，难以继续您做东时的那份阔气。

宋吕希哲《吕氏杂记》记载文彦博入真率会的故事最为有趣：

温公……于是乃与楚正叔通议、王安之朝议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肴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文潞公时以太尉守洛，求欲附名于其间，温公为其显，弗纳也。一日潞公伺其为会，戒^④厨中具盛饌，直往造焉。温公笑而延之，曰：“俗却此会矣。”相与欢饮，夜分而散，亦一时之盛事也。（亦曰平会。）后温公语人曰：“吾知不合放此老人来。”^⑤

吕希哲为熙宁年间与司马光等人同时居洛的吕公著长子，此则记载的可信度非常高。它深刻反映了司马光倡导真率会以抵制奢靡、引导俭朴世风的良苦用心，生怕文彦博的显位与盛饌“俗却此会”。

三 “真率”与“耆英”会名的混同及原因

耆英会和真率会本来是两种怡老聚会，差别较大，前者矜贵炫富、礼节繁缛，为文彦博于元丰五年所发起；后者朴素简便、不拘礼节，为司马光于元丰六年所发起。但是从宋代开始，就有人将真率会看做耆英会的别名，将真率会约看成耆英会约，现代的研究者承袭此说，从未有人加以正确地考辨分析。

与司马光同时稍后的米芾在《九隽老会序草》题下自注曰：“十老会后更名曰‘耆英’，又名‘真率’。”^⑥耆英会之前名“十老会”，未见他处记载，大概是因为耆英会有会员十三名，举其成数而言。范成大《（绍定）吴郡志》曰：“九老会后更名‘耆英’，又名‘真率’。”^⑦楼钥追述真率会的由来，曰：“伊昔羊尹临丹阳，真率之名初滥觞。香山尚齿当会昌，卧云不羨坐岩廊。七人各列官与乡，年德俱高世所臧。丙午同甲遥相望，清谈生风想琅琅。耆英人物尤轩昂，赋诗远追白侍郎。文富归休寿而

①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九，第5册，第258页。

② 《洛阳耆英会序》，《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五，第5册，第160—161页。

③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四，第2册，第454页。

④ 此处“戒”为告诉、预告之意，否则司马光“俗却此会矣”、“吾知不合放此老人来”之语是说不通的。参见《汉语大字典》卷二中“戒”字的第10条解释，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1页。

⑤ 《吕氏杂记》卷下，《全宋笔记》，第1编，第10册，第285—286页。

⑥ 米芾著，黄正雨、王心裁辑校《米芾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⑦ 范成大著，陆振岳点校《吴郡志》卷二《风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康,衣冠十二何锵锵!”^①“文富归休”、“衣冠十二”说的正是耆英会,“衣冠十二”是指除了北京留守王拱辰之外在洛的十二名耆英会会员,诗题曰《朱季公寄诗有怀真率之集次韵》,则楼钥显然是把耆英会当做了真率会。祝穆《事文类聚》前集记载“洛阳耆英”,录《邵氏闻见录》卷一〇关于洛阳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的记载^②,其后“古诗”条录有司马光《耆英会序》及十三位成员在会中所作诗歌,其中所录司马光的诗歌即为前引《和潞公真率会诗》,后又录“真率会约”^③。知祝穆把同甲会、真率会都当做耆英会看待。周密亦曰:“元丰洛阳耆英会……其后又改为真率会云。”^④可见宋人混同耆英会与真率会的说法比较常见。

当代最早对宋诗社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欧阳光先生《宋元诗社研究丛稿》一书,他在《文彦博洛阳耆英会》一节引用了元陶宗仪《说郛》所录真率会约,由此归纳出耆英会活动的若干特点,认为耆英会成员有摆脱官场束缚、“回归自然,任性而为,追求一种较为轻松的生活方式”的心态,这正是耆英会“又称作真率会的原因所在”^⑤。周扬波先生在《宋代士绅结社研究》一书中说“元丰年间陆续出现了五老会、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四个社团,由于成员有相互承接重合的关系,年份又十分接近,可以视为同一个士人会社,总以洛阳耆英会名之”^⑥,与欧阳先生一样亦录《说郛》中真率会约,并把真率会特点当作耆英会特点^⑦。笺校司马光文集的李之亮先生说“闲居洛阳时,他(按:指司马光)发起了一个‘耆英会’,与会者都是相当一级的高官,如前宰相富弼、文彦博等等,然而在制定耆英会章程时,他却强调的是……”,接着便引用了真率会约^⑧。三位学者承袭宋人旧说混淆二会,情有可原,但亦有澄清之必要。那么本来差别明显的两种怡老聚会何以能够被混淆得不分彼此呢?

首先,正如周扬波先生所说耆英会与真率会年份接近、成员多有重叠,地点也都在洛阳,都属于达官贵人仿慕唐白居易九老会的怡老聚会系列,都以“尚齿不尚官”为宗旨,确实比较容易混淆。据周先生的考证,耆英会十三名成员中,有六名是真率会成员,即文彦博、司马光、席汝言、王尚恭、楚建中、王慎言^⑨。其中文彦博和司马光又分别是二会的发起人,相当于士人领袖。而另一位领袖级的人物、耆英会成员富弼在真率会成立的元丰六年去世,未能参加真率会。又,二会仿九老会痕迹都很明显。司马光在《洛阳耆英会序》中说耆英会是“慕效乐天所为”,遵守白居易九老会“尚齿不尚官”的“洛中旧俗”^⑩。邵伯温也说:“潞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⑪白居易九老会以七十岁为入会年龄并行序齿,耆英会亦然,司马光年未及七十,文彦博“用唐九老狄兼谟故事,请入会”^⑫;九老会绘有九老图,耆英会亦有图画。而真率会约第一条即“序齿不序官”^⑬,如司马光有诗题为《二十六日作真率会,伯康与君从七十八岁,安之七十七岁,正叔七十四岁,不疑七十三岁,叔达七十岁,光六十五岁,合五百一十五岁,口号成诗,用安之前韵》,首句

① 《朱季公寄诗有怀真率之集次韵》,《楼钥集》卷四,第1册,第102页。

② 《事文类聚》前集卷四五《乐生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5册,第740—741页。

③ 《事文类聚》前集卷四五《乐生部》“古诗”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5册,第745—750页。

④ 周密著,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二〇《耆英诸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368页。

⑤ 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177页。

⑥ 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2页。

⑦ 《宋代士绅结社研究》,第105页。

⑧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前言,第1册,第13页。

⑨ 《宋代士绅结社研究》,第102—103页。

⑩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五,第5册,第160页。

⑪⑫ 《邵氏闻见录》卷一〇,第104页。

⑬ 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一〇,《宋诗话全编》,第9册,第9797页。

“七人五百有余岁”，诗后自注曰：“乐天九老诗云：七人五百七十岁。”^①此诗后又有《别用韵》曰“座中七叟推年纪”^②，亦序齿之意。同时真率会成员祖无择《聚为九老自咏》诗题下有小注曰：“龙学（按：祖无择时为龙图阁学士）因分司西京御史台，与司马温公九人为真率会，谓之九老。”^③

其次，“耆英”之名非当时耆英会成员所称，乃“时人谓之”，它指明与会者身份，而真率会成员同样皆为“耆英”，这也是足以引起混淆的地方。与司马光、范纯仁、文彦博等人所作诗歌明言真率会不同，耆英会成员所作相关诗歌皆未言耆英会，而是称作“耆年会”或“耆德会”。耆英会大部分成员的文集皆已散佚，现存最早全面收录“耆英会诗”的为南宋中晚期的祝穆所编《事文类聚》前集卷四五《乐生部》，其中除了富弼与文彦博四首唱和诗的后两首以及文彦博给王拱辰的一首寄诗^④外，其余皆未录诗题，而是代之以官爵、姓名、年龄相加，如“武宁军节度使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致仕韩国公富弼彦国年七十九”、“河东节度使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宽夫年七十七”、“尚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从年七十七”等。不管诗题有无，从应社的角度来看，诗歌内容也应该提及“耆英会”或“耆英”，然而除了北京留守王拱辰诗中“投我十二耆英诗”句外，其余皆未言及。同时，诸诗中有两处“耆年会”的称谓，即富弼诗前小注“伏承留府太尉相公就敝居为耆年之会，承命赋诗，谨录上呈，伏惟采览”，以及楚建中诗中所言“归逢大老耆年会”。另外文彦博之诗在其文集《潞公集》中名为《耆年会诗》^⑤。富弼诗中还有句“岂惟名利场，骤为耆德会”，则又称之为“耆德会”^⑥。

此外，与司马光同时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说“元丰五年，文潞公守洛又为耆年会”^⑦。两宋之交的胡仔认为沈括记载有误，分辨道：“苕溪渔隐曰：《温公集》有《洛阳耆英会序》正纪此事，《笔谈》以为耆年会，非是。”^⑧胡仔所言虽有凭据，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显然他并没有仔细阅读富弼、文彦博、楚建中的“耆英会诗”，也没有仔细分析司马光的序言。司马光在《洛阳耆英会序》中说：“一旦，（文彦博）悉集士大夫老而贤者于韩公之第置酒相乐，宾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图形妙觉僧舍，时人谓之‘洛阳耆英会’。”^⑨所谓“时人”当系与会者以外的人。当时远在北京的王拱辰，是接到其他会员诗歌之后才赋诗的，而且有可能已经得知“时人谓之耆英会”的消息。“耆英”一词夸耀意味过于浓厚，不大符合“尚齿不尚官”的宗旨，“时人谓之”应出于一种仰慕与艳羡的心理。而“耆年”如同“九老”，仅有尚齿而无尚官之意。

既然当时仰慕者可称耆年会为耆英会，后来仰慕者又何尝不能称真率会为耆英会？除了与耆英会重合的六名会员之外，真率会其他成员如范纯仁、祖无择、鲜于侁、宋道亦皆为一时耆英，正如司马光《和潞公伏日宴府园示坐客》中所言“真率除烦礼，耆英集上才”^⑩，也是把真率会成员称为“耆英”。这也无怪乎后人将二会混作一谈。

①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四，第2册，第459—460页。

②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四，第2册，第460页。

③ 祖无择《龙学文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809页。

④ 即《弼窃览长篇断章，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赋一绝上呈》，《彦博伏睹公诗，有“第一无双”之句，辄成二十八字上呈》，《彦博代简上君貺宣猷》。

⑤ 《文潞公集》卷七，上册，第95页。

⑥ 所引耆英会诸诗俱出自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四五《乐生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5册，第746—749页。

⑦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页。

⑧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5页。

⑨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五，第5册，第160页。

⑩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五，第2册，第475页。

再次，真率会简于物质、便于备办、略于礼数，更适于娱乐，能够频繁、持久地举办下去，后来居上、将耆英会取而代之为势所必然；又由于耆英会发起人文彦博的加入，真率会约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司马光《用安之韵招君从、安之、正叔、不疑，二十六日南园为真率会》二首其二曰“真率春来频宴聚”^①，《范忠宣公行状》曰：“（范纯仁与司马光）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饮酒数杯，过从不间一日，洛中夸以为胜事。”^②可见真率会举办频率之高。仅从司马光数首真率会诗题目即可见“过从不间一日”并非夸张，如下所列：

《三月二十五日安之以诗二绝见招作真率会，光以无从者不及赴，依韵和呈》

《用安之韵招君从、安之、正叔、不疑，二十六日南园为真率会》

《二十六日作真率会，伯康与君从七十八岁，安之七十七岁，正叔七十四岁，不疑七十三岁，叔达七十岁，光六十五岁，合五百一十五岁，口号成诗，用安之前韵》

《二十七日邀子骏尧夫赏西街诸花》

《二十八日会不疑家席上纪实》^③

三十日因为下雨，真率会暂停，司马光心情较为低落，作《三月三十日微雨偶成诗二十四韵书怀，献留守开府太尉兼呈真率诸公》一诗，开篇曰“春尽少欢意，昏昏睡思添。正忧花气索，更用雨声兼”^④云云，热闹之后更觉寂寞之难耐，显然真率会在司马光那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娱乐活动。其《三月二十五日安之以诗二绝见招作真率会，光以无从者不及赴，依韵和呈》首二句曰：“真率由来无次第（来诗云：真率会名今第几），经旬逾月不为稀。”^⑤知真率会无固定日期，既可以“不间一日”，又可以“经旬逾月”，聚散随缘，符合“真率”的精神。而耆英会则不然，不仅排场大、客套多，而且“皆次为会”^⑥，一轮之后不免难乎为继。再则，耆英会以七十岁为入会年龄，真率会则无此规定，元丰六年司马光、鲜于侁六十五岁，范纯仁只有五十七岁。这更加有利于吸纳更多的成员。

元丰六年十一月文彦博第一次致仕，继任留守是韩绛。他有《留守相公（按：指韩绛）宠赐雅章，召赴东楼真率之会，次韵和呈》^⑦诗，应作于元丰七年（1084），说明真率会是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并且新任留守也参与进来，而此时耆英会的记载已不可见。再考虑到耆英会诸诗并举称颂的文富二相中的富弼在元丰六年去世，上文已有说明，他虽然不是耆英会发起人，因为德高望重头两次聚会都在其园宅中举行，他的去世对耆英会的持续不能没有影响。元祐五年（1090）八十五岁高龄的文彦博第二次致仕归洛，苏辙《送文太师致仕还洛三首》其三曰“白头伴侣谁犹健？率意壶觞夕已疏”，自注云：“公昔与司马公同居洛下，常与诸老为真率之会，酒肴果蔬随有而具。”^⑧文彦博是耆英会的发起人，事隔多年，苏辙却显然对真率会的印象更为深刻，“酒肴果蔬随有而具”也与前引司马光《和潞公真率会诗》中“随家所有自可乐”之语相类，则真率会频频举行代替耆英会之事实可以推知。元丰八年（1085）春宋神宗驾崩，在洛旧党纷纷起复，真率会也到此为止了。

尽管真率会后后来居上，将耆英会取而代之，可是从上引《吕氏杂记》记载可知，文彦博一开始就

①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四，第2册，第458页。

② 《范忠宣公文集》，《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第523页。

③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四，第2册，第456—462页。

④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四，第2册，第463页。

⑤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四，第2册，第456页。

⑥ 《邵氏闻见录》卷一〇，第105页。

⑦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的《文潞公集》依《山右丛书初编》本为蓝本，诗题为《留守相公宠赐雅章，召赴东楼真率之会，次韵和呈》（卷七，上册，第83页），“宰”应为“率”之讹，《四库全书》本即为《留守相公宠赐雅章，召赴东楼真率之会，次韵和呈》（《潞公文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第629页）。

⑧ 《栾城集》卷一六，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册，第324页。

“具盛饌直往造焉”，强行入真率会、故意败坏真率会约。司马光《和潞公伏日燕府园示座客》诗中谈到文彦博作真率会的情况曰“蒲葵参执扇，冰果侑传杯。相国方留客，如何务早回”^①，这种豪华的招待同样违背了会约，而且还不让客人中途退席，更加不是真率之举。文彦博以旧相之尊无视甚至破坏真率会约的做法使得真率会无可奈何地染上了些许耆英会的色彩。虽然司马光与文彦博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者，私人关系亦极亲密，但在生活作风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恰如范纯仁所预见的那样“岂唯同志欣相照，清约犹能化后人”，元丰洛阳真率会因为独特的形式与内涵，加之司马光等名臣的典范作用，在后世屡有仿效者，其影响力不下于唐白居易的九老会，并远远超过了文彦博发起的耆英会^②。仅就两宋而言，北宋末年以及南宋各个时代都有真率会举行，成员众多、身份各异，不再拘于“耆英”的身份限制，并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诗词作品^③，理当引起应有的关注。

[作者简介] 庞明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发表过论文《〈歧路灯〉中的“悍妇”形象》等。

(责任编辑 刘京臣)

①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五，第2册，第475页。

② 如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下编《宋元诗社丛考》列有5个宋代真率会（第155—305页）；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第五章《耆老会》“宋代耆老会一览表”中将真率会增至11个（第96—101页）；陈小辉在他的宋代诗社考证系列论文中又增加了5个。笔者则将这一数量扩充到36个，具体的考证文章日后将陆续发表。

③ 据笔者初步统计，两宋与真率会相关的诗词共计104首，其中诗94首，词10首。